

2015 搞笑诺贝尔奖

文·本报记者 刘园园

一个被蜜蜂蛰过近两百次的昆虫学家，一个想知道男人的身体条件能不能承受生育888个孩子的数学家，以及一个没有把鸡蛋煮熟的化学家……近日，一群很靠谱的科学家凭借着他们“不靠谱”的科研项目，荣膺科学界大名鼎鼎的奖项——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

很疼吗？再试试这里

科学家尝遍昆虫叮咬的滋味才捧回这个奖项，从他们身上我们应该学到——千万不要被蜜蜂叮到鼻孔！

昆虫学家贾斯汀·施密特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迈克·史密斯共同把生理学和昆虫学大奖抱回了家。他们的实验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饱含血汗”：他们通过亲身体会绘制出了被昆虫叮咬到底有多疼痛以及叮在哪里最疼痛的图表。

史密斯的研究方式是将蜜蜂按到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直到蜜蜂叮咬他：连续38天这么做，每天被叮咬5次，共有25个部位被叮咬。然后将疼痛程度从0到10进行排序，最后公开发表。按照他的实验结果，被蜜蜂叮咬后最疼痛的部位是：鼻孔、上嘴唇和阴囊。

与史密斯一同上台领奖的施密特也蛮拼的：几十年来他都在专门从事关于叮人的昆虫的研究，为了科学，他身体的很多部位也做出了“牺牲”。施密特的“叮咬疼痛指数”虽然

据英国《卫报》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研究人员、学生以及真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上周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场齐聚一堂，参加了第25届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这是科学界最荒唐的庆祝仪式，专门表彰那些“让你忍俊不禁，然后若有所思”的科学研究，颁发者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

只从0排到4，不过这位昆虫学家在疼痛指数中详细描述了被78种昆虫叮咬的滋味——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说的语言也极富天分，仿佛他是一位在酒窖里鉴定美酒的品酒师。

例如，白脸胡蜂的叮咬，经施密特“品尝”后被鉴定为：“浓烈，酣畅淋漓，而且有点酥脆。就像你的手被旋转门挤烂了一样。”再如，大黄蜂的叮咬被鉴定为：“热辣而又余烟袅袅，毫不留情面。想象一下喜剧演员W.C.菲尔德斯把烟头放在你舌头上摁灭了。”不过，这两种叮咬的疼痛指数只能排到2。

疼痛指数被列为4+的是子弹蚂蚁的叮咬，这种蚂蚁惩罚受害者的手段是：“纯粹、剧烈、无以伦比的疼痛，就像一个三寸长的生锈的钉子扎进你的脚后跟，然后再让你赤脚走在燃烧的木炭上。”

寻找真正的“男神”

一生生育上千个孩子，大长腿高颜值和他比简直弱爆了

还有一些没有冒太大危险的科研人员，凭借研究人或动物身体的奇怪特征获此殊荣。

例如，一位性交能力非凡的17世纪的摩洛哥皇帝——穆莱·伊斯梅尔是数学奖得主伊丽莎·奥比佐切和卡尔·格莱姆的研

究课题。这两个科学家被只活了55岁却号称子嗣遍地的穆莱·伊斯梅尔的故事所迷住。他们想弄明白一位男性的身体极限能否承受生育1171(有人称888)个孩子，就像这个传说故事所声称的那样。



据报道，两位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证明，他真的有可能生出这么多孩子！想要在32年的生育年龄里生1171个娃，伊斯梅尔只需每天发生性行为0.83到1.43次，后宫阵容也只需65到110名。

“事实证明(生育这么多孩子)需要做大量工作，”奥比佐切说：“穆莱需要每天性交一到两次，你可能觉得这个次数不算多，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每一天，而且是他全部人生中的每一天，这真的是个庞大的数字。”

不用脸红，这只是在治疗过敏

接吻疗法、开车诊断法，医生的脑洞还真宽广

来自东欧和日本的科研人员凭借研究“热吻和其他亲密举动”对健康的好处夺得了医学奖。他们的展示方法是在颁奖仪式上亲自上阵亲吻对方并检测其结果。其研究证明，热吻可以缓解多种过敏症状。

另一项同样获得医学奖的研究发现，医生可以通过一个人从减速路障上开车过去时是否疼痛来诊断他是否患有急性阑尾炎。这一项目的科研队伍庞大，包括来自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中国等十几个国

家的科学家。

来自智利和美国的一组生物学家的好奇心与小孩有一拼：他们把木棍插在鸡屁股上来观察它会如何走路。结果是这些鸡走起来“跟我们认为的恐龙的走路相似。”这组科学家成功地总结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题目是：“像恐龙一样走路：带有人工尾巴的鸡为非鸟类恐龙的运动提供线索”。该研究让他们夺走了此次的生物学家。

真的不是在搞笑！

煮熟的鸡蛋“生”了

折叠还是不折叠，对于蛋白质来说是个严肃的问题

动物撒尿需要多长时间？来自美国和台湾的物理学家凭借找到动物的“撒尿法则”获得了物理学奖。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在21秒左右(误差为13秒)清空膀胱，不管其是一头大象还是一只地鼠。研究人员大卫·胡表示，撒尿时间之所以与动物的体积没有关系，是因为重力充当了非常好的平衡器，“个头越高，尿得越快”。“所以下次你在卫生间等空位时，可以直接敲敲门，然后温柔地提醒他：你应该用21秒尿完。”大卫说。

搞笑诺贝尔奖每年都会设置10个奖项，今年除了上述大奖还设有化学奖、文学

奖、环境奖等。例如文学奖的桂冠花落三位研究人员之手。他们发现，“啊”这个词几乎在每一种人类语言中都存在，虽然其写法不同。

化学奖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捧走，他们成功地用一种高速涡旋流体装置，使未折叠的蛋白质恢复成折叠的蛋白质，简单地说就是让熟鸡蛋变回了生鸡蛋。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了让蛋白质再次折叠的方法。理论上，这一设备的应用价值远不止于让熟鸡蛋变回生鸡蛋。它大有用武之地，包括使癌症的治疗方法和奶酪的工业制造方法发生变革。

今年没中，明年请早儿

也有获奖者搞着搞着，就真搞成诺贝尔奖了

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由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主办，可追溯至1991年。25年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凭借各种稀奇古怪的研究夺得了这一奖项，其中有：教鸽子辨认毕加索和莫奈，乡村音乐对自杀的影响，把可口可乐作为杀精剂，爱熬夜的人更可能是精神病……

所有获奖人员都将得到一笔“天文数字”的奖金——10万津巴布韦币——相当于2美元。今年的颁奖仪式上还有一部三幕迷你剧，剧情是地球上数百万物种一起争夺“最好的物种”这一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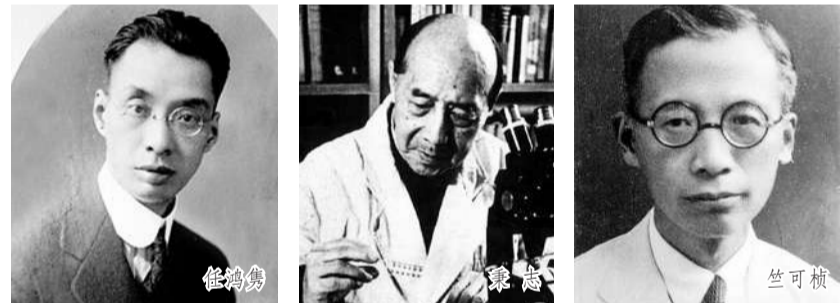
不过，搞笑诺贝尔奖得主中也不乏一些杰出的科学家。2000年，利用磁铁使青蛙

悬浮在空中的荷兰科学家安德烈·海姆荣获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十年后他凭借对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研究斩获了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的科研成果也可能是古怪的、有趣的，甚至是荒诞的。”《不可思议研究年报》官网解释，搞笑诺贝尔奖的目的并非恶搞科学，而是“庆祝与众不同的，表彰想象力非凡的——以此激发人们对科学、医学和技术的兴趣”。

今年的颁奖仪式以搞笑诺贝尔奖创立者马克·亚伯拉罕斯的经典结束语宣告闭幕：“如果今晚你没有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特别是以前你曾获得过——你明年获奖的胜算会很大。”

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⑭



文·徐丁丁

创刊于1915年的中文《科学》杂志，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其成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发刊《科学》，以求在中国提倡、传播科学，发展实业。可以说，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科学》杂志是中国近代科学共同体的喉舌，承载着那

个时代的中国科学家们共同的理想、目标与情怀。

作为一份纯粹的科学期刊，早期《科学》杂志的文章大多以介绍科技知识、刊登科研成果为主，涉及军事和国防的内容并不多。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迅速改变了这种发刊意图。

从象牙塔内发出的“科学救国”呼声

当时，化学武器被认为是费用低、杀伤大的新型武器，日军在这一方面具有的优势以及中国军民相关知识的缺乏，引起了中国科学家们的关注。1931年12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译自国外的长文，对化学武器及其战术进行了详细介绍。全文将近一半的篇幅用于讲述防毒气的方法，特别是吸附式防毒面具的原理和用法，译者的良苦用心一目了然。

20世纪30年代，早年经过西方现代科学洗礼的中国第一、第二代科学家，此时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着比旁人深刻得多的认识。中国科学社的首批成员、著名气象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目睹国内科学发展的滞后和战备水平的落后，曾撰文提

出严厉批评：“我国对于科学研究，平时鲜加注意，一旦战事开始，方感科学研究之重要！”当时的日本虽然在整体国力上无法与美国、苏联等国家相比，但面对近代工业体系尚未建立的中国，却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唯有重视科学，提倡科学，方可救民族、国家于水火之中。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奠基人、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在《科学与国力》一文中写到，“外患肆虐，祸逼眉睫，锦绣河山，日削月蹙”，只有努力发展科学，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他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教育和培养科学精神。虽然困难重重，但“未有不可由科学解决之者”。字里行间，充分展现出科学家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坚定信念。

从散漫的自由研究到国家统筹的科学理念

然而，对贫弱的中国而言，科学研究不应只是花瓶点缀，战时的科学应当怎样为国家服务？秉志等人认为，不当只看重实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研究，只有两者齐头并进，国家的科技实力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竺可桢则从科研事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首先称赞苏联“由政府之力量，主办研究事业”的成就，隐含表达出对一个强有力的

政府主导国家科技发展和建立科研体系的认同。然而，由于近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研究大多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因而，如何凝聚有限的科技力量，科学家群体开始自发地予以思考。1935年，新任《科学》杂志主编的人类学家刘咸在其执笔的社论中，第一条建议即树立科学国策。他提出，在普及科学教育、传播科学常识、建设科学工业、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奖励

科学成绩、统筹科研经费等问题上，都应当从国家需要的层面予以通盘考虑。1939年，《科学》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译文，介绍苏联的第三次五年计划与苏联科学的发展规划。显然，随着战争程度的加深，中国科学界对于政府主导下的科技发展体系有了更深层次的期待和向往。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各界感受到全面战争的空前危机。早在清华大学开设国防化学课程，吸引大批青年学子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愤然写到：“在这

种非常时期，科学家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培养科学界的新生力量，必要的时候，也应当投笔从戎和普通士兵一样上战场。”但是，把宝贵的科学人才白白浪费在前线，并不能真正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当时有人认为，科学家群体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同时又适应时代需求、发扬国防科学研究，并通过科学成绩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样才能发挥出科学家自身最大的能力和价值。这种看法应当是比较贴近科学界的实际情形的。

从宏观设想到研究具体问题

1936年后，《科学》杂志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原先科学救国的宣传，集中到较为具体的问题上。七七事变后，《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批有关科学与国防的文章，如“经济树木与国防”“耐火材料工业与国防”“植物油提炼汽油之展望”等，均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具体的国防科技问题。此后，从国防科技，到后方建设，到国家层面的工业布局，以及科学教育、战争中的科学应用等文章，陆续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群体对战时中国科学发展的思考的进一步成熟。

1938年后，《科学》杂志自身的出版也遭遇了危机。稿源缺乏、印刷成本上涨、交通不便，杂志被迫改为双月刊的形式，并减少页数。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科

学》的同仁们继续对抗战有关的科学技术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当时汽油、柴油等燃料奇缺，1939年，燕京大学化学系的罗宗实连续发表三篇长文，详细探讨汽油的制造和抗老化问题。为了投入实用，在撤到后方之后，他还和燃料化工专家侯祥麟等人一道受命在重庆附近办了一个植物炼油厂。此外还有人研究如何用稻草制造无烟炸药。由于中国缺乏橡胶，当时许多卡车的轮胎破了无法修补也无法更换，只能往里面填充棉花等物继续使用。1943年，曾在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任教的生物化学家彭光钦在广西发现国产橡胶作物薜荔，并着手开始试制橡胶制品。对于这一成绩，植物学家裴鉴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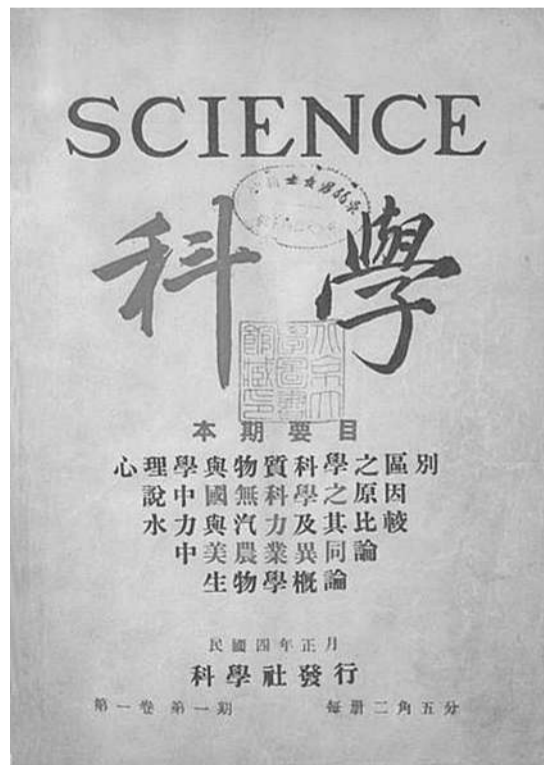
对工业化的设想

战争是科技与国力的较量，是两个国家之间科技能力、工业能力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全面竞争。但是，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建设都不过刚刚起步，彼此之间的联系尚严重缺乏，要达到相互促进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中国科学家们对这

一前景是乐观的，他们认为，战争的压力或许能使科学成果和工业生产之间的转换加快，但是这个过程必须由国家统筹和投入。参考美国在二战中国家统筹下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科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认识到，要实现科学救国，

从理想到工业化

——从《科学》看抗战中科学家对“科学救国”的思考



1936年后，《科学》杂志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原先科学救国的宣传，集中到较为具体的问题研究上。七七事变后，《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批有关科学与国防的文章，均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具体的国防科技问题。此后，从国防科技，到后方建设，到国家层面的工业布局，以及科学教育、战争中的科学应用等文章，陆续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群体对战时中国科学发展的思考的进一步成熟。

必须使科学与工业相结合，古老的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但在当时，贫弱的中国却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政府缺乏动员能力和统筹能力，而科学界和工业界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沟通。从事研究的人往往与实用脱节，而从事生产的通常也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这种情形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学界和工业界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予以协调发展，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后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的神经生物学家卢于道认为，即使有强有力的统筹规划，要克服工业化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亦是需要细心而坚韧的努力。这种努力之苦，殊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亦非发明家及制造家所及意料”。这种想象虽然十分模糊，却有难能

可贵的历史洞见。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今日之光辉成就，已经足以告慰先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科学》杂志很快恢复了它作为一份科学期刊的本色，与军事、国防科技相关的文章逐渐减少。但十多年的战火硝烟，仍给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它从早年那份只用于发表科研成果、传播科技新知、看似仍在象牙塔内的刊物，到抗战结束后成为了一份真正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的变迁，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救国”道路上的漫漫求索，前辈们崇尚科学、坚忍不拔的精神，至今催人奋进。(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